

中國之友杜勒斯

● 王文慶

極力遏阻日軍侵華

近世以來，中美關係密切，在美國眾多的政治人物中，對中華民國最友善的官員，首推艾森豪時代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

律師出身的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可說是中華民國的患難知己，每當中國遭逢危難，必挺身助一臂之力。民國四年，日本對華提出廿一條件，年輕的杜勒斯曾力圖阻止，可惜晚了一步，袁世凱喪心病狂竟予接受，使他徒呼負負。民國廿七年抗戰開始，國軍節節敗退，美國曾圖調停中日和解，杜勒斯力陳不可。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後一再警告中美兩國政府正視史達林具有擴張心態的「列寧主義」。一九四九年促成中日和約，一九五三年完成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一九五八年促艾森豪協防金門。每次都幫了大忙。中華民國在台灣有今天的成就，杜勒斯功不可沒。

民國卅八年，中共在大陸建政後，主控外交的周恩來，曾試圖拉攏美國，在國際會議中對杜勒斯笑臉相迎，逢迎巴結，但堅決反共的杜勒斯不假辭色，不屑與之握手周旋，致使中共改弦易轍，全面倒向蘇俄，日後更在冷戰架構下，執行圍堵蘇俄與中共的戰略目標，形成自由與集權三十餘年的對峙，但也促成中華民國的安定繁榮，逐漸步向富強。

十九歲起接觸中國

杜勒斯於一九〇八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成績優異，旋又轉入喬治華盛頓大學攻讀法律，以兩年時間完成三年課程，通過考試取得律師資格，即在紐約華爾街一家律師事務所擔任律師。一九〇七年，他的外祖父當過哈里遜總統的國務卿的福士達 (John Watson Foster) 應聘為李鴻章的外交顧問，隨中國代表團出席海牙的國際和平會議，攜青年杜勒斯同行，這是他接觸中國事務的開始。十九歲的杜勒斯以秘書身分，協助翻譯法文資料，表現優異。

一門中三位國務卿

後來他的姨父藍森 (Robert Sansing) 受聘為中國駐美大使館法律顧問。一九一五年六月，藍森出任美國國務院顧問，建議美國

通知日本，「廿一條件」應予戰後再議，不料中國的袁世凱先一步接受了日本的條件。是年六月二十三日，藍森出任威爾遜總統的國務卿。次年夏，日本派特使石井赴美，企圖藉中國參加歐戰為由，獨霸在東亞（包括朝鮮、琉球及蘇俄遠東地區、中國東北、華北等地）的特權。石井深知藍森國務卿與中國關係密切，抵美後儘量減少與國務卿的談判，而與威爾遜總統直接會談。結果藍森只好遵守總統的指示，與日本簽下秘密協定，除重申中國門戶開放及保持領土完整的原則外，承認日本在華有「特別權利」，這一結果，看在藍森助手杜勒斯的眼中，印象特別深刻。

到了一九五二年，當年外交助手的杜勒斯追隨外祖父、姨父當了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一門出了三位國務卿，在美國史上留下佳話。

美蘇冷戰堅拒妥協

由於杜勒斯長於寫作，經常為文評論時事，所以自三十年代開始，在美即聲譽鵲起。一九三八年（民國廿七年）抗戰開始，國軍不是日軍對手，節節敗退。對中國懷有特別感情的杜勒斯於是年三月來華，同行的還有美國基督教大學董事會的代表葛里西（Earl H. Cross）。兩人到漢口晉見蔣中正委員長及其他政要。同時向美國駐華大使詹森提出一份備忘錄，促美國政府和公民在任何情況下均無擔任中日和平調停人的條件和基礎，詹森大使表示同意他的見解。這時英國正和意大利協商地中海問題，杜勒斯認為英國將在解決地中海問題後，加強其在遠東的影響力，甚而會迫使中國接受日本的若干條件。杜勒斯在會見當時我外交部次長徐謨時，提出這一見解，請我政府參考。事後證明杜勒斯的見解正確，戰後的文件顯示汪精衛和近衛文麿的和平談判，就是由英國牽線，在義大利駐華大使館中談成的。

一九四五年九月，中美英法蘇在倫敦舉行戰後五國外長會議，杜勒斯以美國國務院顧問身分隨國務卿貝納斯（James Byrnes）參加，親睹蘇俄外長莫洛托夫的冷峻面貌，會議中途，莫洛托夫突然提議討論對意大利、希臘和芬蘭的和約時，中法兩國未參加對三國的受降，不應出席討論會。表面觀之，此為單純的程序性的提議，實際則在嘗試分化非共國家，杜勒斯一眼即看穿莫洛托夫的陰謀，促請貝納斯堅拒蘇俄的要求，直言此事「無妥協的餘地」。次日，貝納斯正式拒絕蘇俄的提議。這是美國戰後首次對蘇俄說「不！」，從此美蘇外交冷戰，持續達卅年之久。

杜勒斯深知蘇俄圖謀支配世界的野心，他再三向美國人指陳史達林手著的「列寧主義問題」一書，如同希特勒著「我的奮鬥」，內涵征服及支配世界的各種戰略和策略。歐戰時期，許多人忽視了「我的奮鬥」，而今不能重蹈覆轍，再犯錯誤，忽視史達林的書。作為虔誠基督徒的杜勒斯主張用基督教的仁愛精神對付邪惡的共產主義。他的警告曾被許多自由派學者和政客譏為「杞人憂天」，但他不為所動，手著「和平的精神基礎」及「外交家和他的信仰」兩書，大力鼓吹他的反共思想。

策劃簽訂對日和約

民國卅八年（一九四九年），大陸剿共局勢逆轉，中共佔據大陸，杜勒斯在美國參院大聲疾呼：「太平洋防線建已自東方敞開，

史達林在廿五歲時即在所寫文章中指出「自東方可很容易的攻擊西方」，蘇俄從那時就支持中共坐大，目的即在此。又說，他在一九三八年於漢口親眼看到這個事實。可惜美國民主黨政府沒有聽進耳朵，一直把中共當成改革者，壓迫國民政府對中共讓步，以致中共後來席捲大陸，這一事實證明杜勒斯的看法正確。

中國大陸陷共後，日本也面臨威脅，佔領日本的同盟國感到防衛日本的負擔太重，必須設法簽訂對日和約，使日本有限度的整軍，自我防衛。但此舉亦有日本軍國主義東山再起的疑慮。然而美國總統杜魯門卻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八日宣佈，任命國務院顧問杜勒斯主持對日和約的策劃工作，接獲任命後，杜勒斯即飛抵遠東，考察日本韓國的實際情況，會晤美國駐日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及日本首相吉田茂，聽取他們的意見，不料五月廿六日韓戰突然爆發，美軍大舉增援，阻遏侵略。對日和約的籌簽，致遭擱置。

韓戰初期，戰爭形勢不利。美國急於制訂對日和約，一九五〇年八月七日，杜勒斯草擬完成具體方案，經國防部及國務院同意後，由杜勒斯利用他駐聯合國美國常任代表的身分和相關各國外交部長或代表磋商。但蘇俄的反應是對日和約應由英美法蘇四國一致同意，弦外之意就是拒絕。

一九五一年，杜魯門總統任命杜勒斯為無任所大使，分訪英法澳紐諸國，討論對日和約草案，結果各國都提出了草案，促使美國草案一再更改。

但杜勒斯始終不接受英國所提「將台灣交還中國，由中共參加簽約」的提議。經他再三折衝，達成「俟日本自主後由其自己決定與那一個中國簽約」的協議。我中華民國政府一直爭取簽約權，杜勒斯不厭其煩的多次向我國說明協商的經過與困難。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三日，新任駐日盟軍統帥李奇威將軍，指令日本只能和盟軍統帥部的外交代表接觸，暗示日本只能和駐有軍事代表團的中華民國談判。同時美國國會一致支持杜勒斯的立場，當時日本藉口美英尚待協調，拖延協商，杜勒斯和美國參議員赴日，警告日本首相吉田茂，日本須待美國批准對日和約後才能獲得安全保障，吉田茂在強大壓力下，於十二月二十日決定與中華民國簽約，並用書面文件送交美國。一九五二年一月，英國首相邱吉爾及外相艾登專程飛美，企圖說服杜魯門改變原議，但杜勒斯把日本的書面文件作擋箭牌，此一名為「吉田書簡」的文件由杜勒斯送交英國駐美大使過目，而未拿給邱吉爾和艾登看。邱艾兩人返回倫敦，英國大使認為兩人甫自美國歸來必然已看過吉田書簡，故而未提此事，一月十六日邱艾尚等待和約生效後日本表示態度時，吉田書簡已在美國公布。

英國指摘杜勒斯違背諾言，杜氏以其律師的辯才極力維護自己的立場，說明是日本自己的決定，其實是一九五一年一月李奇威指令下必然結果。

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在蘇俄有計劃的抗議下，五十二國代表美國舊金山簽訂對日和約，和約簽訂後，美國國務卿艾契遜對杜勒斯極為讚佩，日後在回憶錄中說：「杜勒斯的論證無可爭辯，且值得尊敬的」。

對日和約關鍵人物

作為一位共和黨人，在民主黨政府服務，杜勒斯有如此優異的表現，全憑聲望、才能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一九五三年，艾森豪當選總統，杜勒斯受命出任國務卿，立即清除掉親中共的國務院官員謝偉志和戴維斯，一掃國務院骯髒之氣。但作為國務卿的杜勒斯對中華民國最大的貢獻，則是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這個條約首由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向美國提出。

當時，中共開始砲擊金門，美國聯合參謀首長雷德福上將力主強硬反擊，艾森豪總統顧慮蘇俄與中共的緊密關係，邱吉爾更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故未採納雷德福的主張。

艾森豪雖有意協防台灣，但反對國軍軍機轟炸大陸。於是杜勒斯叩命來台，會晤蔣中正總統，商訂中美雙邊防禦協定。幾經磋商，始告完成。

這個條約大致而言是以東南亞公約作藍本，其中第六條明白載明協防範圍為台灣澎湖及經共同協議之其他領土。確保金門馬祖的暗示呼之欲出，蔣中正總統對此一條約深感滿意。

協助國軍撤離大陳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中共攻擊大陳群島，雷德福又主張反擊。杜勒斯認為外島如無美國協助，必將一一陷落，十月十九日美國國會批准特別授權的咨文，於是艾森豪下令由美軍協助，撤退大陳駐軍，集中力量保衛台灣。

接著美國國會對遠東情勢進行討論，由杜勒斯提出說明，結果美國眾議院以四一〇票對三票，參議院以八十三票對三票，否決了民主黨的修正案，以壓倒多數通過，授權美國總統在台灣海峽使用美國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案。一九五八年中共大舉砲轟金門，一日發射了數萬發炮彈。

艾森豪立即授權杜勒斯發表文件，明白指出「保護金馬與保衛台灣日益有關。」「美國已做出軍事佈署，以便總統一旦作出決定，可採取及時有效的行動」。

運送巨砲支援金門

杜勒斯同時公開演說指戰術性的核子武器，可在地方性有限度的情況下使用，而無極端的不良後果。因此當美國把八吋可射核子彈頭的大砲運抵金門前線時，赫魯雪夫警告美國：「另一方也有原子武器可以使用。」英國外相也往華府勸阻艾森豪，同時美國國內也有懼戰的呼聲，但艾森豪沒有動搖，八吋大砲在金門怒吼，只是未放核子彈頭而已。中共由於消耗過多，後援不繼，蘇俄口惠而實不至，乃於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宣佈停火一週。十月十八日杜勒斯由義大利飛抵台北，會晤蔣中正總統，就當時的局勢交換意見。不料這是這位中國摯友的最後一次訪華。

一九五九年四月，杜勒斯因病辭職，艾森豪總統頒授他文官最高勳章的自由勳章，表彰他對國家的貢獻，美國報界說他是美國有史以來最有權勢的國務卿。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杜勒斯因癌症逝世，享年七十二歲。遺體葬於華盛頓的國家公墓。